

文革中的外交極左問題

• 卜偉華

一 關於極左的不同提法

在不少論及文化大革命時期外交情況的著述中，都提到了「極左」這個詞。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①：

「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在對外關係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夥插手外事部門，興風作浪，甚至圖謀篡奪中央的外交大權。……對於這些極左錯誤，周恩來和廣大外事幹部一直表示反對，並努力設法制止。毛澤東也多次提出批評，要求糾正。經過他們採取一系列措施，外事工作一度出現的偏差較快得到糾正。

王泰平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中說^②：

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認為，國際形勢「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1968年10月，林彪在國慶講話中提出「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行動口號，推行世界革命。江青、康生等人誣毀建國十七年來執行的是「三降一滅」（即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線，否定外交工作的偉大成就，在外事機構煽動奪權，致使中央外交大權一度旁落，外事工作一度失控。……周恩來總理為使正確的外交路線能夠繼續貫徹執行，一方面對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反覆進行批評教育，另一方面對林彪、康生一夥推行的極「左」路線進行了鬥爭。……毛澤東對干擾外交工作的極「左」錯誤也多次提出批評。

在不少論及文化大革命時期外交情況的著述中，都提到了「極左」這個詞。這些著述有着一個共同的基本觀點：原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外交路線，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極左路線干擾、破壞，後又為毛澤東、周恩來所糾正。這種觀點流行很廣，但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

石志夫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中說③：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林彪、江青、康生等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政治人物和勢力進而全盤否定「文革」前的外交路線。……從1968年起，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便有步驟地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狀態。

王繩祖主編的《國際關係史》中說④：

1965年9月，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發表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稱頌了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然後，他分析了世界的局勢：「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196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對這篇文章加以肯定。這種在世界範圍搞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領域的極「左」行動。……「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方面的極「左」做法使60年代前半期中國外交開創的良好局面遭受重大損失，中國在世界上幾乎處於孤立狀態。從1968年起，毛主席、周總理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糾正那些錯誤。

以上四種引文中，關於文革中外交上的「極左」問題說法不盡相同，具體措詞也不一致，有「極左錯誤」、「極『左』思潮」、「極『左』路線」、「以極左面目出現」、「極『左』行動」、「極『左』做法」等多種不同說法，而這種用詞混亂的現象存在，顯然不利於對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四種引文有着一個共同的基本觀點，這個觀點可以大致描述為：原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外交路線，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極左路線干擾、破壞，後又為毛澤東、周恩來所糾正。這種觀點流行很廣，但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

早在文革之前，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即逐漸朝着更「左」的方向滑去。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外交方面的方針、路線及重大決策即由毛澤東親自把握。到文革發動之際，中共中央的集體領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所代替。中共中央集體在對外關係方面做出的重要決策，可以被毛澤東的一句話輕易否決。

二 愈來愈「左」的外交路線

早在文革之前，中國共產黨內就開展了對王稼祥的批判，將他提出的在外交問題上比較正確的意見批為「三和一少」。從此，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即逐漸朝着更「左」的方向滑去。1965年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在闡述和發揮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同時，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近乎空想的世界範圍內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設想。這篇文章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批准，顯然不應該僅看作是林彪個人的創作，此文的主要觀點在當時為全黨全國人民所接受，幾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外交方面的方針、路線及重大決策即由毛澤東親自把握。到文革發動之際，中共中央的集體領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所代替。中共中央集體在對外關係方面做出的重要決策，可以被毛澤東的一句話所輕易否決。1966年上半年，在是否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和與日共聯合公報問題上的結果即為兩個很典型的例證。

文革開始以後，「左」傾思潮空前泛濫，中國對外關係全面緊張。到1967年夏，中國除與美國、蘇聯繼續保持相互敵視的態度外，與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尼泊爾、蒙古、英國、捷克、肯尼亞等國家都出現了外交糾紛。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仍然孤芳自賞，盲目樂觀，認為「形勢很好」^⑤。本來是危機重重，應當努力修補對外關係，而毛澤東卻偏要擺出一副「和尚打傘，無法括（無）天」的姿態。毛澤東雖然批評過在對外宣傳上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種提法，但從他所說「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⑥來看，他並不認為這句話本身有甚麼問題，問題是應該由外國人來說這句話。實際上，在文革初期，《人民日報》等報刊就大量登載過外國朋友稱頌中國「文化大革命」，將中國稱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報導。不僅如此，毛澤東本人在內部談話中也明確地講過中國應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樣的話。

1967年7月7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並講了話。這篇講話集中地反映了他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和他的對外關係主張。毛澤東說^⑦：

目前許多地方反華，形式上好像是我們孤立，實際上他反華是害怕中國的影響，怕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華是為了鎮壓國內的人民，轉移人民對他統治的不滿。這個反華是美帝蘇修共同策劃的，這不表示我們孤立，是我們在全世界影響大大提高。他愈反華愈促進人民的革命。這些國家的人民認識到中國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們中國不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區）也可以。就是要公開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

毛澤東同意批判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他還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武裝鬥爭。為了達到支持世界革命的目的，哪怕破壞與鄰國之間正常的國家關係也在所不惜。196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就中國共產黨參加中緬兩黨會談的代表團成員組成問題給周恩來並報毛澤東的報告上，提出了中共代表團組成人員建議名單，其中包括江青。5月26日，毛澤東批示：江青以不參加為好^⑧。由此可知，在1967年5月下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在中國進行了會談，中共中央確定了要公開支持緬甸共產黨搞武裝鬥爭的方針。毛澤東在7月7日的講話中說：「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他們同我們斷交，我們就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⑨

文革初期，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和他的對外關係主張都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關於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及公開支持外國共產黨搞武裝鬥

毛澤東雖然批評過「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種提法，但他並不認為這句話本身有甚麼問題，問題是應該由外國人來說這句話。毛澤東本人在內部談話中也明確地講過類似的話。1967年7月，毛澤東說：「我們中國不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區）也可以。就是要公開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

爭、輸出革命等觀點顯然都是錯誤的。而且在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盛極一時的情況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現對毛澤東的錯誤的糾正。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文革全局性的錯誤之下，還存在一條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外交路線的說法，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歷史實際。

三 極左的典型案例：「三砸一燒」

文革中外交上極左的典型案例是發生在1967年6月至8月的「三砸一燒」事件。現將其分別簡述如下：

印度是率先承認新中國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曾與中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第一次軍事衝突之後，兩國關係惡化。1962年10月，因印度不斷蠶食中國領土而引發了中印邊境武裝衝突。1967年6月12日，新華社報導：「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最近竄至北京西郊某地，對我軍事禁區進行窺測和偷攝禁區照片，被我人民解放軍當場拿獲。同日，外交部照會印度駐華使館，提出最強烈抗議，並宣布：自即日起，中國政府不再承認魯冠南的外交官身份，而且在中國司法機關對其罪行進行法律制裁前，魯冠南不得離開中國。」6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萬人公審大會，對魯冠南進行缺席公審。判決魯冠南犯間諜罪，判處驅逐出境，立即執行。並宣布印度大使館三等秘書維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其三天內離開中國國境。6月14日，魯冠南被押送離京。印度政府很快作出強烈反應，下令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一等秘書陳魯直立即離印，並宣布中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承浩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印。6月16日，印度大批暴徒衝入中國大使館，打傷多名使館工作人員，暴徒還放火燒了大使館汽車房裏的車輛和使館外面的一個展覽櫥窗，打碎了使館建築物的許多玻璃窗。其後大批印度軍警嚴密包圍了中國大使館，剝奪使館人員外出行動的自由，使館同北京的聯絡中斷。6月17日，中國外交部第一亞洲司負責人召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沙梯，向印度政府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並宣布：「自即時起，印駐華大使館全體印籍人員，未經中國有關當局的許可，一律不許離開大使館，否則，一切後果由印度方面自己承擔。」6月18日，大批示威遊行的北京紅衛兵和各界群眾湧入印度駐華大使館，砸毀大使館部分設施。

緬甸曾是中國的友好鄰邦。1967年6月，中緬之間因為毛澤東像章事件關係惡化。事件的起因是中國駐緬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澤東語錄和毛澤東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干涉。過去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在緬甸也散發過表示效忠英國女王的徽章，這種記憶使得緬甸方面對像章事件特別敏感和忌諱。為此，緬甸政府制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在國內文革運動的影響下，中國一些駐緬人員把國內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做法也搬到緬甸來了。6月23日，中國駐緬臨時代辦就「6月22日，仰光原中國女子中學的學校當局強行剝去華僑學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並公然侮辱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事向緬甸外交部提出抗議。緬甸政府於當天宣布封閉

文革中外交上極左的典型案例是發生在1967年6月至8月的「三砸一燒」事件。1967年6月12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犯間諜罪，判處驅逐出境，立即執行。6月16日，印度大批暴徒衝入中國大使館，打傷多名使館工作人員。6月18日，大批示威遊行的北京紅衛兵和各界群眾湧入印度駐華大使館，砸毀大使館部分設施。

原中國女子中學和原華僑女子中學。此後又無限期關閉了九所華僑中學和小學。當地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數十名華僑和學生在衝突中喪生。6月26日，韓念龍副外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國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眾四十萬人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7月1日，中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轉交中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在6月29日備忘錄中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無理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緬甸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到7月3日為止，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抗議的群眾累計超過一百萬人。3日下午，北京各大群眾組織在故宮午門召開了十萬人的抗緬大會，聲討緬甸政府。會後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大使館，砸了大使館的一些設施。

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關係破裂發生在1965年9月。當時印尼發生了一場流產政變，親華的以艾地為首的印尼共產黨參與其事。印尼輿論對中國的不滿激增，軍人趁勢發動政變，對中國友好的蘇加諾總統下台，印尼共產黨遭到嚴厲鎮壓，隨後爆發了一場迫害印尼華僑的大規模反華排華浪潮，中印(尼)關係迅速惡化。1966年9月2日，印尼外交部通知中國大使館：從亞齊地區被無理驅逐到棉蘭集中的受害華僑共4,500人，要求中國政府派船把他們接運回國。中國政府一方面要求印尼政府立即停止集體驅逐華僑的種族主義暴行，一方面派船前往棉蘭接運受害華僑。1967年4月23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緊急召見印尼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巴倫，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包圍、封鎖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武裝劫持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的嚴重事件。4月2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印尼政府粗暴踐踏國際關係準則，悍然宣布我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欢迎的人」，喪心病狂地迫害華僑的反華暴行。4月26日下午2時，北京各界群眾集會，聲討印尼政府的反華行徑。從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學校師生、工人、機關幹部等各界群眾連續前往印尼駐華大使館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累計人數超過六十萬人。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並未能使印尼政府的反華排華政策有所收斂。印尼境內頻繁發生反華排華事件，印尼武裝軍警和暴徒多次襲擊華僑，造成流血事件。8月5日，北京以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的群眾組織和各界群眾在抗議和示威遊行後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此舉致使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於8月6日和10月5日兩次遭到襲擊和搗毀，並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8月14日上午，外事口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8月19日，由進駐外交部的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團小分隊封了外交部黨委，宣布「一切黨政大權歸聯絡站」。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十九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由北京一些大專院校和機關企業的造反派組織聯合組成的「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

1965年9月印尼發生流產政變，親華的以艾地為首的印尼共產黨參與其事。印尼輿論對中國的不滿激增，軍人趁勢發動政變，印共遭到嚴厲鎮壓，隨後爆發大規模反華排華浪潮，中印(尼)關係迅速惡化。1967年8月5日，北京以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的群眾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此舉致使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於8月6日和10月5日兩次遭到襲擊和搗毀，並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以上四次嚴重的涉外事件，在表現形式上非常相似，都是在與某一國發生糾紛時，不尊重國際慣例，不講政策，以群眾遊行示威或召開大會的形式，對該國的駐華機構採取暴力行動。中央文革小組和新聞媒體對群眾的盲目行動不僅不加制止和引導，反而推波助瀾，使事件產生嚴重的後果。這些事件都嚴重破壞了兩國關係，中國駐外機構均遭到嚴厲報復，同時使中國在世界上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

1967年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由北京一些大專院校和機關企業的造反派組織聯合組成的「反帝反修聯絡站」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圖）。8月22日晚，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四 一則重要的史料

據後來北京一些造反派頭頭揭發的材料說，聲討緬甸政府的大會是戚本禹策劃的。戚本禹找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開會說：「中央文革認為有必要開大會抗議緬甸政府。政府發表的聲明，有局限性。總理做事穩重、謹慎，未免有點保守。會後要搞兩路遊行，一路到緬甸大使館，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領導看看群眾的革命精神。」根據這些材料和王力的「八七講話」，有些人便將1967年在外交上的極左行動歸罪於所謂「王、關、戚」。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王、關、戚」不過是替罪羊而已。至於是誰的替罪羊，卻不是很清楚。按照現

在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林彪、江青、康生在搞極左路線，「王、關、戚」應該是他們的替罪羊。

實際上，林彪是緊跟毛澤東的，在外交問題上並沒有講多少他自己的話。江青、康生確實在外交問題上發表了不少言詞激烈、信口開河的話，但若將主要責任歸於江、康二人，可能也還是不夠的。

據王力回憶^①：

7月1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戚本禹等人的談話中說：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毛澤東說：現在在我們國家裏，群眾今天提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沒有甚麼了不起。他舉例說，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沒有甚麼了不起。他還說，群眾喊打倒奈溫的口號，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這是一則非常重要的史料，對於我們解開1967年外交上的極左之謎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筆者認為，王力的這個回憶是可信的，有三條有關的材料可以與之相互印證。

材料之一，即王力的「八七講話」。8月7日晚，在王力與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談話時，「聯絡站」的代表就提出：「中央許多精神下不到我們這裏，如主席7月1日對緬甸問題的指示，我們不知道。」^②這份記錄中提到的「主席7月1日對緬甸問題的指示」，應當就是王力所回憶的毛澤東與張春橋、戚本禹等人的談話。

材料之二，即毛澤東1967年7月7日的講話。毛澤東說^③：

現在形勢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對國大黨搞武裝鬥爭。印尼共產黨清算了修正主義已起來。緬甸游擊隊也有很大發展，比泰國武裝鬥爭還有基礎，已搞了幾十年，過去黨不團結（有紅旗黨、白旗黨）現在統一起來了，反對奈溫是一致的，武裝活動地區已佔緬甸地區60%，緬甸比南越的地理條件還好，回旋區大。泰國的地理條件也很好。緬甸起來，泰國起來，這樣就把美國完全拖在東南亞，當然我們還必須着眼在我們國土上早打、大打。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他同我們斷交，我們就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

這篇講話距毛澤東7月1日的談話相隔不到一周，所講關於緬甸的內容一脈相承，應當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材料之三，大約在8月10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關鋒、戚本禹的講話。王、關在講話中對外交部多方指責。例如，關於抗議緬甸政府的社論，《人民日報》和外交部各寫了一個，說外交部寫的那一篇「旗幟不鮮明，戰鬥力不強」。最後用了《人民日報》寫的那一篇。還有，《人民日報》在新聞報導中提到了

現在較流行的觀點，是林彪、江青、康生在搞極左路線，「王、關、戚」不過是替罪羊而已。據王力回憶所說：「7月1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戚本禹等人的談話中說：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和其他材料相印證，聲討緬甸政府的大會及其他外交上的極左事件，不過是貫徹了毛澤東的主張。

「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外交部向《人民日報》提出了質問。另一件事，蒙古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發請柬時名單中有蕭望東、周揚、蔣南翔等人。外交部將周揚的請柬扣下，其他的照發。《人民日報》認為此舉為明顯的挑釁行為，第二天《人民日報》對此事未予報導，外交部又去電話提出質問。關鋒說，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到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針鋒相對，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甚麼呢？就是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關於緬甸問題，如果是在7月1日以前，那沒有甚麼話可說，7月1日後，主席對緬甸問題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講的，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戚本禹同志講，外交部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怕這怕那，甚至於挨罵的時候，自己還在那裏說兩國友好關係。戚本禹同志說：看來今後外交戰線上希望寄託在這些年輕的小將身上。姚登山講了一個口號單子的故事。緬甸事件剛起，群眾上街遊行，他看到第一亞洲司的同志起草了一個口號單子，其中有「打倒奈溫反動政府」，送到部黨委，去掉了「反動」二字，韓念龍解釋說，這句子太長了，所以去掉。戚本禹聽到這個話很生氣，說：這個句子不是長不長的問題，而是敢不敢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問題^⑭。在姚登山傳達的關鋒講話中，明確地披露了毛澤東7月1日談話的內容。

另外還有一個間接的材料。1967年7月初，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有少數人不滿中國的革命宣傳，到中國圖片展覽館搗亂，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向尼外交部提出口頭抗議後，尼方申明它珍視兩國友誼，不允許損害兩國關係的事情在尼土地上發生，為圖片展覽館事件向中國表示道歉。中國大使館認為可不再提書面抗議了，但康生卻主張「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結果於7月21日就「尼泊爾國內的反動勢力侮辱中國人民和蓄意破壞中尼友好的嚴重反華行為」向尼泊爾政府提出了最強烈抗議^⑮。不難看出，康生是在現買現賣，他的主張不過是毛澤東在緬甸問題上主張的翻版而已。

所謂極左，就是指左走到了極端。在文革中，對甚麼是極左，站在不同立場的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在1966年6月中下旬，北京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浪潮，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是在野右派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爭奪運動的領導權。毛澤東則認為反對工作組的才是真正的左派。

五 極左與「左」

在筆者看來，所謂極左，就是指左走到了極端。物極必反，極左已不是左了，可以稱其為帶引號的左（「左」）。實際上，極左與「左」是一回事。

在文革中，對甚麼是極左，站在不同立場的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在1966年6月中下旬，北京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浪潮，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是在野右派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爭奪運動的領導權。毛澤東則認為反對工作組的才是真正的左派。

毛澤東也曾經提出過要批評極左派思想。1967年5月27日，外交部翻譯唐聞生、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幹部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總理的風氣，……我們絕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毛澤東於5月29日在唐、王來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

說服工作。」^⑩當年9月，他在一次談話時說：「幹部垮得這麼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話，是教育左派的問題。」^⑪196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了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對待極左派的經驗。這份文件認為，極左派中絕大部分群眾是老造反派，有的單位(如醫學院)在「火燒省市」時期有較大貢獻。他們的主要錯誤是以反右傾為名，一度把矛頭指向省「大聯籌」和省革籌小組。可以看出，毛澤東眼中的極左派，還是造反派，批評極左派思想，是為了教育左派。

文革中極左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在文革中先後被冠以「極左」的帽子遭到批判的行為、思潮大致有：「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堅持派性，搞武鬥；「揪軍內一小撮」；炮打周恩來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奪外交部的權以及在外事上的極端行動。所有這些表現形式，究其根源，其實都是來自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也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理論。

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斷發動群眾起來造走資派的反，奪走資派的權，對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造反行動高度讚揚，大力支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派性的產生源於文革理論和指導思想的荒謬和混亂，尤其是開展「全面奪權」後，由於觀點和利益的分歧，導致了造反派的分裂。而文革中武鬥長盛不衰的原因，除了江青提出「文攻武衛」這樣蠱惑人心的口號外，還有「武裝左派」的這樣具有更大危害性的口號^⑫。「揪軍內一小撮」其實不是甚麼新鮮的東西，「揪軍內一小撮」本來就是文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文革是幹甚麼？就是要揪黨內、軍內、政府內的「一小撮」，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明白宣布了。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並不是不要揪「軍內一小撮」，而只是不要公開提揪「軍內一小撮」，不要單獨提揪「軍內一小撮」，其實只是一種策略的提法。炮打周恩來的問題，關鍵在於周恩來確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對文革有所懷疑和抵制，當然會引起激進的造反派的抵觸。而所謂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首先在於毛澤東憑空製造出了兩個司令部的概念，同時又沒有將如何區分兩個司令部的標準講清楚。外交部的奪權，是在「全面奪權」的大背景下發生的。1967年初，外交部與國務院其他各部委一樣都開展了奪權，並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後來把外交部的奪權當作極左來批，主要是因為發生了「三砸一燒」這樣產生了嚴重後果的事件，而這一系列事件發生的原因，讀者自可從本文前面的介紹中找到答案。

在一些論著中，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稱為「左」傾錯誤，而把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以及王、關、戚或一些激進造反派的言行稱為極左思潮，這樣似乎是劃清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實際上，極左與「左」只有程度的不同而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有過明確的說法。1985年，他在談到黨內「左」傾錯誤的歷史發展過程時說到^⑬：

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到1976年搞了整整十年，黨內的骨幹差不多都被打倒了。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幹部。

文革中極左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在文革中先後被冠以「極左」的帽子遭到批判的行為、思潮大致有：「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堅持派性，搞武鬥；「揪軍內一小撮」；炮打周恩來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奪外交部的權以及在外事上的極端行動。所有這些表現形式，究其根源，其實都是來自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也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理論。

1987年，他又指出：「可以說，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⑫筆者認為，鄧小平這種把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作為極左來批判的觀點，是值得我們認真領會的。

註釋

- ①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527-28。
- ②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1-12。
- ③ 石志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 1949.10-1989.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191、194。
- ④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九卷（1960-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頁378、380。
- ⑤⑦⑩⑬ 毛澤東：〈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的兵工廠〉（1967年7月7日），引自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編印的《學習資料》。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也見諸其他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材料中。在有的版本中此文題目為〈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1967年7月7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江青等參加了接見。現初步斷定毛澤東〈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的兵工廠〉一文為在這次接見時的講話。
- ⑥ 1968年5月18日發出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重要通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126。
- ⑧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55；359。
- ⑨ 此照會事先經周恩來批簽，事後周恩來常自負疚，引為教訓。1967年11月12日，周恩來在接見數十位回國參加運動的駐外大使時，為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再次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說，他不應該批發為要求香港啟封報刊而提出的限期四十八小時的通牒，結果導致造反派的過激行為。參見宗道一：〈「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中華兒女》，2002年第1期，頁35。
- ⑪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1017。
- ⑫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動態組根據記錄整理的〈王力同志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的重要講話〉。
- ⑬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第三動態組所編的《動態》第120期（1967年8月12日）上刊登了姚登山的傳達講話。
- ⑭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10。
- ⑮ 毛澤東同程世清等的談話（1967年9月16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04-1505。
- ⑯ 1967年8月10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其中提出：「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33。
- ⑰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37。
- ⑱ 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37。

卜偉華 任職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曾發表〈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關於「文革」中北京的「天派」與「地派」〉等文章，合著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